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有戏剧的地方 就有我

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王薇 任一宁 / 选编

YOUXIJUDEDIFANG
JIUYOUWO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

——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YOUXIJUDEDIFANG
JIUYOUWO

ISBN 7-5059-4587-4



9 787505 945876 >

ISBN 7-5059-4587-4/I·3576

总定价：146.00元

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

——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王薇 任宁 选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 王薇，任一宁选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6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第六辑·1-6 / 吉狄马加，黄济人主编)

ISBN 7-5059-4587-4

I. 有… II. ①王…②任一… III. 王大虎—电影文学剧本—文学评论

—文集 IV. J207.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974 号

| | |
|-------|----------------------------|
| 书 名 |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第六辑·1-6) |
| 主 编 | 吉狄马加 黄济人 |
| 出 版 社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部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顾 苹 |
| 责任印制 | 李寒江 |
| 印 刷 厂 |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开 本 | 850 × 1168 1/32 |
| 字 数 | 1542 千字 |
| 印 张 | 74.625 |
| 插 页 | 23 页 |
| 版 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59-4587-4/I·3576 |
| 总 定 价 | 146.00 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王大虎·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

1962年5月摄于重庆美术广告公司



1939年重庆私立巴蜀小学毕业



1941年就读重庆中正中学



1946年夏就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1948年秋重庆张家花园国家门口

前排左起：二：曾容、三：王蕾、四：王泽汉；
中排左起：二：王大虎、四：宋义；
后排左起：一：程谦谋。



1948年春 重庆西南剧艺社



1952年冬重庆黄山干部疗养院

与时俱进唱大风

序《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 吉狄马加 黄济人

巴渝文苑花似锦，与时俱进唱大风。

在党的十六大精神的光辉照耀下，新世纪文苑阳光灿烂，百花盛开，万木争荣，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肩负着重大使命的西部文学工作者，实践党中央发展先进文化的战略决策，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辛勤耕耘，勤奋创作，向人民奉献出一大批丰硕的文学硕果。

乘十六大的浩荡东风，在重庆直辖市成立7周年之际，为了检阅重庆作家的实绩，为了召唤文学新军，我们继选编出版《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一至五辑以后，又精心选编了《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第六辑。她是重庆作家献给新世纪，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

重庆是一座拥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她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巴渝文化、三峡文化与红岩文化。她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放射出独特的光辉。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硕果累累。特别是重庆直辖以来，重庆人民奋力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给的四项神圣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重庆正日益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迈进。

伟大的时代给重庆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新时期以来，

重庆文学秉承光荣的文学传统，感应时代的召唤，取得了突出的创作实绩。作为有深厚文学底蕴的巴渝作家群体，作为文学“渝军”，她在全国文学界的地位日益提升，实力日益显现，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学特色。

第六辑《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推出六位有影响的老中青作家作品。再耕的诗歌集《行走的风景》，是这位辛勤的歌者对现代城市发展深情的颂歌。华敏的《华敏杂文》是作者20年杂文创作的精选集，对社会、人生有深邃的思考。辑录重庆老一代戏剧评论家王大虎的文集兼回忆录《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既是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又是一部情真意切的纪念文集。王端诚散文诗词选《端诚诗文卷》，抒发丰沛的人生感受，其运用旧体诗词的探索与造诣，尤为人称道。刘江生的报告文学集《21世纪：我们做成功者》是作家报告文学的精选，展示了许多当代企业家的奋斗轨迹与风采。土家族作家维扬的散文集《三余走笔》，写故乡情、故乡风物，以及东游江浙的感悟，别具一格。

此辑的作品，题材广泛，生活涵盖面丰厚，风格亦是丰富多彩的，展现了当代重庆作家多方面的探索与追求。

这辑丛书只是选编了近年来活跃于重庆文坛的部分作家的作品，受条件所限，尚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未能一一入选，这只有以期来日了。但透过这套丛书，依然可以窥见重庆作家基本的创作风貌与创作潜力。我们相信，在新的世纪，重庆作家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将会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奉献于这个伟大的时代，从而汇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洪流之中。

作者简介

王大虎(1927-1963)影剧评论家。原名王泽资,笔名王大虎、雷天啸、张羽等。四川西充县人。民国24至28年(1935-1939),在重庆巴蜀小学读书。民国28年至31年(1939-1942),先后就读于重庆钟南、犍江、中正中学。民国32年(1943)考入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攻读戏剧创作专业。民国36年(1947)在南京就读时因病辍学返回重庆。他在中共地下党员程谦谋等动员下,于民国37年(1948)出面发起并组建了西南剧艺社,并在该社任学术股长兼演员,参加了《孔雀胆》、《秋海棠》的演出。当年秋,该社经费难以维持,他与该社演员曾容、刘健、席向等借潘自新的边疆剧社名义,又在三三剧场上演《凶手》(即《毋宁死》)一剧。但在演出中途,他却因肺结核病咯血不止而从此脱离舞台。

王大虎曾出任重庆《新民报》(晚刊)之“新影剧”副刊编辑,并专事影剧评介和戏剧理论工作。他虽患病在身,依然勤奋敬业,自民国36年(1947)9月14日首次发表剧评《略谈〈大雷雨〉及其作者》之后的两年间,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影剧评介、戏剧理论和杂文、随笔共125篇,见诸重庆报刊。这期间,大凡出现在山城舞台、银幕上的话剧和电影,他几乎是每戏、每片都必看,必评。在其《评〈四季〉》、《自由万岁——评〈希望在人间〉》和《试论戏剧之通俗化——形式、技巧、语言》等文章中,态度严谨,文风犀利,爱憎分明。对于肆意表现凶杀、色情及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则严正批判,大张挞伐,进而发出《向“黄色”总攻——继〈黄色音乐滚出去〉后的呐

喊》。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他还数度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脱离险境。

1949年重庆解放后，王大虎先后在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重庆分会创作部和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创作委员会工作，继续从事影剧评介、理论研究及积极参与文学、戏剧各类活动，并于1950年秋与友人筹办《观众报》(周刊)，并任主编，至1952年6月因全国报刊调整而停刊。

1957年和1958年，他连遭不白之冤，被开除公职，由居住地居民委员会监督改造期中，于1963年9月病逝，终年36岁。1979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原载《重庆文化艺术志·人物传记》，2002年12月)

留得残红想春时

——读《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王大虎影剧评论选》

(序)

穆 仁

(一)

答应王蔷、王薇姐妹，通读她们选编的纪念父亲的文集，并尽力减少一些文字上的错讹，原以为月把工夫可以竣事，不料却拖了好几个月。除了别的杂事临时插入打断之外，还有老年阅读常易发生的迟滞现象——读到书稿中提及的某些自己当时也略有所知所感的情事，就禁不住一下子滑入几十年前的记忆，久久不能自己……眼前的文字不用说就读不下去了。或许这种今昔纠葛的阅读迟滞现象，是七老八十的读者的通病吧？……

正是这种不断的今昔对照、印证，求同存异的思考、综合的结果，使我对眼前这本书稿、对半个世纪以前认识的作者王大虎、对许许多多我认识不认识的同龄人，逐渐凝聚成了一种更鲜明、更深刻、更完整的青年群体的印象。他们是中国一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当时社会上习称（他们也以此自诩）之为“追求进步的青年”（或简称之为“进步青年”），他们大都爱好文学，因此也有称之为“爱好文

艺青年”(或“文艺青年”)的。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兴趣爱好千差百异,但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却在他们身上烙下鲜明共通的时代特征:他们出生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于动乱的三、四十年代,他们以振兴中华、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人生理想,不屑于追求狭隘渺小的个人幸福或实现个人价值;如果他们投身为文,自然是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为职志了。他们是自觉地把集体的利益摆在个人的利益之上的。也因此,主张外抗列强内求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成了他们思想上的灯塔,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最终参加了革命队伍,与此同时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则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而作为历史悲剧的是,当年对现实政治无知的进步青年由于天真的正义感与对民主自由的憧憬,也很快遭到了极左路线的迫害,王大虎在还未唱完新社会的颂歌时就遭遇 1957 年的灾难以至英年早逝,就是一出令人扼腕的悲剧……

留得残红想春时。从《有戏剧的地方就有我——王大虎影剧评论选》保留下来的残篇断简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进步青年高尚执着、真诚无悔的精神,可说是此书无可取代的价值。

(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进步青年,如果至今还在,已是七老八十的年纪了。有的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人还在作着老而不休的奋斗。至于他们的贡献,历史大多作出了应有的评价。他们之中,有名垂青史的伟人,也不乏各行各业的名家,但更多的却是名气不大、勤奋地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贡献的人,青年影剧评家王大虎就是其中之一。王大虎病死于 1963 年,

到 20 世纪九十年代四川剧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话剧演员在发言中这样惋惜地提到他:“解放初,重庆有个王大虎,每戏必评,既是内行,又肯讲真话。即使是批评,也使人受益。可惜这样的剧评家现在少见了。”(引自王小遂《怀大虎》一文)古话说,“政声人去后”,这迟到几十年仍铭刻人心的认同,我以为是对王大虎的劳作最好的评价,远胜于那种言不由衷的泛泛溢美之词。

王大虎是 1947 年在南京国立剧专毕业后回到重庆,开始拿起他作为影剧评论家的笔来的。从此一发而不可止,奋笔写了 10 年;由于他的勤奋,有时几乎三天两头重庆报刊上都有署名“王大虎”的影剧评论发表,因此在读者心目中形成了“王大虎 = 影剧评”的鲜明印象。当时没有电视,影剧院是城市消闲娱乐的热点,大城市报刊不少(1948 年重庆每天出版的日晚报即有 20 多家),发表影剧评的园地也不少,但执笔者多系偶尔为之的票友,像王大虎那样既具专业素质,又把写影剧评作为一种事业全身心投入的,重庆并不太多,全国也颇少见。于是有人把王大虎与上海的梅朵相提并论,朋辈间遂有“西王东梅”或“渝王沪梅”之说。梅朵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影剧评家(也是剧专校友),我 1946 - 1947 年在上海求学时,常在上海《文汇报》上看见他发表的戏剧评论,但影评却写得较少。上海《文汇报》在全国的影响远非重庆报纸所能及,所以难以此定高下。但从一个爱读影剧评的读者角度来品评,我却以为二者各具特色,各有长短:梅的剧评以老练深刻取胜,王的评论则以真诚亲切见长;专家学者或许喜欢品尝梅的某些见解,一般读者却更爱王的直言无隐与娓娓谈心。这是评论文字的两种路数,与作者的经历素养、读者的性格爱好有密切关系,不好用一根尺子去量的。上面引用的那位话剧演员的议论,即是一例。

细读大虎影剧评,似乎可以用八个字去概括它的特色,那就是

“切实、有益、实话实说”。切实，就是紧密结合影剧映演的情况，不用外加框框去扭曲或褒贬它；即使是有感而发的议论，也是切合实际的演绎，而非天马行空的玄论。有益，即是力求评析有助于一般读者欣赏影剧水平的提高，业者借此反馈有所借鉴，而不满足于作者的自说自话、自我发泄。实话实说不仅涉及作者的见识，也关乎作者维护真理的胆量与正直程度。这八个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学识素养，也体现了大虎从为人生而艺术的戏剧到为人民的戏剧的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与审美情趣。

从《〈夜店〉观后》一文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切实有益、实话实说的特色。作者几乎全面地坦述了他对这出戏的演出的看法：从剧本基调的把握，导演舞台区位的安排、细节的强调，到演员对所扮角色的理解与表现的得失，以及布景欠当的模仿等等，都作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评述与商讨。意见不一定准确，却都是当行的批评，远非泛泛臧否的评论所可及；在评劣的同时，亦对优点予以肯定与鼓励，充分显示了与人为善的批评态度；这对观众和业者无疑都是有益的。至于《怎样看电影？》一文，以平等对话、朋友谈心方式，对观众提高欣赏水平提出的若干切实建议，我以为对今天的观众也是可供参考的。

在“切实有益、实话实说”之中，最难坚持的是“实话实说”。王大虎在《人情与事情——关于戏剧批评》一文里，就喟叹过涉及具体人事关系的批评之难，说真话之难。王大虎的影剧评论品格之可贵正在于此：不管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戏剧界熟朋友，或是鼎鼎有名的前辈名家，他都坚持作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评论平辈人演出如此，评名家之作亦然。无论是当时好评如潮的国内名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或对他自己赞赏的苏联片《拿破仑征东》，他都同样实话实说地指出其缺点与不足，充

分体现了他的此一态度。

王大虎影剧评论质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的过程。他20岁起执笔,到他被迫停笔时恰好是30岁(1947-1957)。十年影剧评随着他生活工作的变化而扩大了关注范围,认识也不不断深化,但评论风格却是一以贯之,十分性格化的。在我的印象中,王大虎影剧评风格是:有时不免肤浅,但却不乏精辟;坦诚与人为善,故能以心换心,即使是偶尔迷失于左的文艺思潮(如解放初的某些观点),也能很快改正;他勤于学习、思考,因而进步、提高迅速。他在《从“卖座不好”说起——谈谈有关话剧的几个问题》(原载1956年8月重庆《红岩》杂志)一文中,提及的对“干巴巴和老一套”(概念化是产生公式化的根本原因)、“戏就应当有戏”(说教导致观众冷淡)、“样式、风格、独创性”(生活的多样化与艺术的多样化)、“把‘金的桥梁’搭起来”(对民族戏曲遗产的继承发展问题)等戏剧界共同问题的思考,不仅当时十分深刻,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因为它涉及中国戏剧艺术发展成长的根本方针。在20世纪50年代,年仅30岁的王大虎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

老实说,对于编印这本书的认识,我也是几经变化的。最初,听王薇谈起她们姐弟的这一打算,我以为纪念亲人是老百姓应有的权利,不应让名人、伟人垄断,理应支持;后来,读到她们辑录的散佚文稿,联想起半世纪前情景,感到王大虎确是重庆读者不应忘记的评论家,此书不仅值得亲友留念,也有公开出版价值;最后通读全部书稿,我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本书稿的出版,不仅对重庆人、